

珍贵的双金闸水志碑和铁锭

■ 葛以政

双金闸在淮安市淮阴区马头镇运河北岸的双闸村（曾经隶属过杨庄镇、凌桥乡），是中国大运河这份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遗产点，包含在清口枢纽遗产区之内。如今双金闸的功能已经变成中运河北側和淮沔河西側低洼区域（凌桥大米的出产地）翻水站的出水闸了，当然也可以在干旱时段从中运河进水灌溉良田。



双金闸图片

双金闸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点，本应是因为它在清口枢纽的形成和运行过程中发挥过的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闸址的多次移动和其功能的不断变化，人们很难认识它在历史上的用途和地位。如今可以看到的**双金闸**，是作为我国使用水泥胶接技术的最早成果被载入史册，才使得它有可视物体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点的。近期查得乾隆年间重立的双金闸水志碑的拓片(正面和背面，是2021年才获得的珍贵资料)和刻有“双金闸”字样的铁锭照片，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一、乾隆年间重立的“双金闸水志”

原碑正面是“双金闸水志”的繁体字。“水志”就是水标尺，古代的水标尺就是标上刻度立在水中用来显示水位高程的木条或木桩。

原碑背面的横排大字是“御示河头”四个字，“御”就是皇帝，此

字高出一格，以示对皇帝的尊崇；四个字的意思是，此碑是按照皇帝的旨意树立在河头的。竖排小字的繁体字为：“康熙四十二年改挑中河行运，志桩长二丈，碑座与桩顶相平。乾隆三十九年五月重立”。这里面的含义就很多了。其中的关键词是“双金闸”“改挑中河”“重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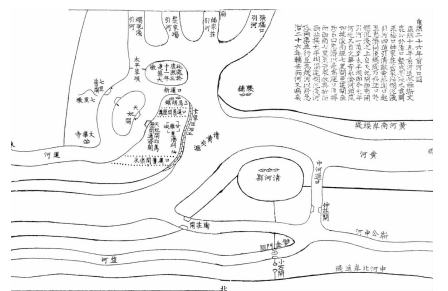
先说“双金闸”(双金门闸)。双金闸最早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咸丰清河县志》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建双金门闸于县治之西”。当时的河道总督靳辅给康熙皇帝上

疏：“洪泽周廻数百里，所引上流分黄之水，一时不能灌满，仍难免黄流倒灌。今再于清河县西建双金门大闸一座，并于闸下挑引河一万余丈，如遇黄河十分异涨，立起此闸，分泄归海，则淮黄会合之处又可减黄水一二尺，有裨运道”。就是说，此时的双金闸是为排泄黄河水之用的，他的位置是在清河县治(今码头镇旧县)之西的。

再说“改挑中河”。既然是“改挑”就必须先有“中河”。中河就是中运河，是康熙二十年(1687)开凿的。

《咸丰清河县志》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开中河，自仲庄至于宿迁。”新铺向康熙皇帝上疏：“臣先所请于清河县西仲庄创建双金门闸以泄异涨，今宜改为三丈深之单金门大闸；又于拦马河西加挑运河二千余丈，直接张庄运口；再于遥、缕二堤之中加挑中河一道，上接运口，下历桃源、清河、山阳、安东，以达于海。俾粮艘既出清口，于黄河内止行数里，即由仲家庄闸内进入中河，历拦马河直进张庄运口。此闸既泄黄涨，又能使各船避黄河之险溜；行有纾之稳程，是大有益于转漕；而各工运料亦可不至稽误矣。”“仲庄”在清河县境内，“张庄运口”在宿迁境内。中河水自张庄运口而来，到清河县会入黄河再东下入海。运粮船只出里运口(南运口)，需要度过几里远的黄河，由仲家庄闸(原“双金闸”的位置改为“单金门大闸”即“仲家庄闸”，“仲家庄闸”成为通漕之闸了)进入中河，逆流往宿迁方向而去。“中河”水流平稳，漕船北上就比以前在黄河中逆流行进安全而快捷了。

下图是《咸丰清河县志》中的《康熙二十六年前河图》。图的中下方可见“双金门闸”的四个繁体字。“双金门闸”在康熙二十四年初建的时候是在“仲庄闸”位置上的，刚过了两年，就变化了位置。位置一变，它的功能也就改变了。此时的双金闸所泄之水，主要是中河之水，其下游当时被称为“下中河”(后来被称为盐河)



“改挑中河”的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实施者是河道总督张鹏翮，“改挑中河”的关键措施之一是改北运口于杨庄。《咸丰志》记载：“康熙四十二年春，河道总督张鹏翮公按照康熙皇帝的指示，于中河盐坝处所挑引河穿子堤由双金闸入盐河，至花家庄迤东穿黄

河缕堤至杨庄出口，长二千三百零八丈。南岸自中河子堤起至黄河边止，筑堤一道；北岸自双金门闸起至花家庄止，以遥堤为北堤，自缕堤外起至黄河岸止，筑束水堤一道，内建草坝二座，收束水势，防黄倒灌。又，双金门闸机心窄隘，难以行运，改造草坝。”可见此时的双金门闸机心(可见前图)被拆除了，扩展了闸门的宽度，以草坝代替原先并列的两道闸门，其目的是为了冬春之际“行运”。此时的“行运”主要是将东部海边的柴草运上来，作为防护堤坝工程的材料。满船柴草，体积庞大，因而拆除了双金闸机心。

“康熙四十二年改挑中河行运”时，双金闸上不仅有水志，而且有水志碑，其“志桩长二丈，碑座与桩顶相平。”就是说，当时水志的桩木是“二丈”长，桩上有水位高程的刻度；水志碑的碑座与水志桩的桩顶一样平。桩随闸立，碑树闸边。这样一来，水志碑的高程也就很清楚了。

“重立”双金闸水志碑的时间是“乾隆三十九年五月”。然而，志书上却没有记载，其后续记载则连续反映了双金闸的变化历程。《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记载：“盐闸。康熙四十二年建，乾隆二十三年圯，移建旧闸迤西五十丈。嘉庆十八年复移于双金闸下新钐口坝内。以上旧闸皆拆起无存。”《续纂清河县志》记载：“双金闸。按：前志云名盐闸，道光八年改建双孔石闸，二十七年重经拆建。光绪七年，总督左文襄公宗棠，漕督杨公昌浚合词疏请移建，乃距旧闸六十丈为新闻，幸山乙向，金门各广一丈八尺，墙高二丈四尺，上裹头广二丈，下裹头广二丈，机心围十七丈六尺，梭尖式，九年十月兴工，十六年六月竣工。”以上记载可知，从双金闸到盐闸，再到双孔石闸，由双孔到单孔，再由单孔回归双孔，前后有转换有承接，其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可以这样推断，“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双金闸没有重建，而只是“重立”了“双金闸水志碑”。应该是水志的桩木朽坏了，重新树立了水志桩和水志碑。据《咸丰清河县志》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之前，清口治水形势严峻，连王家营减水坝都反复启放了。可见盐河的泄水任务更是常态化了，双金闸水志碑的“重立”就是必然之事了。

左宗棠等人于光绪七年(1881)共同上疏移建的双金闸，到民国十年(1921)，被大洪水冲毁了。民国十一年(1922)，民国政府聘请英国工程师莱因规划设计并主持修复的双金闸，成为中国水工建筑史上最先使用水泥胶结技术的民国节制闸。此时的水志就不会再用木桩了。而乾隆三十九年的“双金闸水志碑”就是清口枢纽遗产区中双金闸遗产点上最为重要的清代实物见证了。

二、刻有“双金闸”字样的铁锭

今年7月10日，我与三河闸管理处的张敏总工程师微信对话，他给我发来了2021年才发现的刻有“双金闸”字样的铁

锭，原来是洪泽湖大堤上的周桥大塘石工在2021年倒塌了一段，发现了镶嵌在石工中的许多块刻有不同字样的铁锭。应文物局要求，在石工修复时，为了衔接石块和保持文物原状，又将铁锭放回石工墙里面去了。幸亏他拍下的照片记录了历史真实，写出的文章（《清代洪泽湖周桥大塘石工铁锭铭文解读》发表于2022年6月《江苏水利》）传承了珍贵的水利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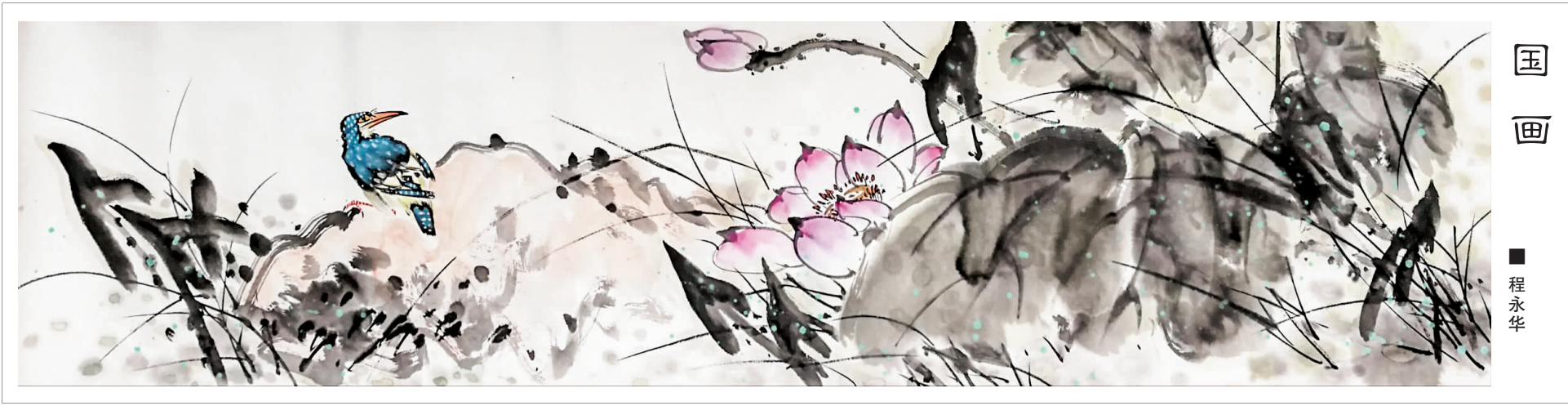
铁锭背面的“双金闸”明文



铁锭正面都是阳文，其中下排左四这块有“双金闸”字样

这一新发现，终于使我们见到了清代“双金闸”的铁证。康熙二十四年(1685)初建双金闸，这样的铁锭一定会很多。后来经过不断修建、改建、重建，其石料和铁锭等构件也会随之被利用。道光八年(1826)将“盐闸”改建成“双孔石闸”，双金闸的名称得以恢复。而周桥大塘石工是道光十年(1828)至十二年(1830)修砌的。初建或改建双金闸时遗留下来的带有“双金闸”字样的铁锭就被周桥大塘的修砌工程利用了。由于双金闸后来又有拆建、移建之举，特别是民国十年(1921)被大洪水冲毁之后，其石料和铁锭等构件散落在民间的应该有许多(我家原有一块铁锭，是父亲得到并作为垫砸工具而使用的，当时有些疑惑，但不知道是文物。我爱人李锦兰也记得其上有“钦工”二字，可惜多次搬家，这件文物早已不知去向了)。期待带有“双金闸”字样的铁锭等文物不断出现，继续丰富清口枢纽遗产区及其各个遗产点上的实物印证。

现在的双金闸承载的历史是清口治水节制黄河到运河再到盐河水位的全过程。尽管“1957年，淮沐新河开挖，彻底截断淮河通道，双金闸逐渐废弃”，现在的主要功能已经转变为汛期排涝翻水站的出口闸了(千旱也可进水灌溉)，但“保存状况良好”的双金闸依然是“清口枢纽”运河遗产中不可多得的能够说明问题的水工遗存，因此成为清口枢纽遗产区中一个独立的遗产点。



久违了，清江浦船工号子

■ 何永年

儿时，我家住在清江越闸(又称小闸)西边不足100公尺处，船工号子是我最早听到的优美的音乐。那时，运河水十分湍急，大小木船逆流而上，多经越闸，一定要有上游河两岸两岸绞关同时牵拉，船只才能十分艰险地过闸，过闸尤如过鬼门关，随时有发生船毁人亡的危险，弄船人那种万分紧张、忙碌的情景，至今尚记忆犹新。过闸前往往要烧香点烛，磕头跪拜，祈求神灵保佑，平安过闸，妇女儿童均安置上岸，以防不测。过闸时粗犷有力的绞关号子在运河两岸有节奏地回响，人们都会驻足观看过闸时的险情，为船家那紧张忙碌的情景而提心吊胆。船在闸塘逆流而上时掀起的巨浪往往向船头拍打倾泻，这时一定要有两三名船工用柴席在船头抵挡，否则载重船灌进立马沉没。顺流而下的船只多经大闸，因河道较直，不像经越闸要拐弯，但下闸往往比上闸还危险。

船过闸后开始拉纤，如是小船，船工们沿着河边或淌水或踩着碎石蹒跚前行；倘若大船，船工们沿着河北路(现漕运路)石工堤岸向前进，这时候拉纤的号子便悠扬响起。如遇东风或东南风、东北风，船上便拉起篷帆，以助一臂之力。在升起篷帆时，又响起了短促的号子。

那时北门桥是活动桥面，船过则可开，没有其他桥的阻隔，因此上下水船只可顺利通航数十里，如无特殊情况，中途无须停靠。

2011年5月20日下午，在中洲公园清江浦楼下，销声匿迹半个多世纪，久违了的

船工号子又唱响了。原来，是在世界文化遗产日即将到来之际，为抢救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船工号子，由市运河博物馆主办、市政协文史委、《淮海晚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协办，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进行首次演练，未想到达到预期效果。6月4日又一次进行座谈和排练，为公开展示做好充分准备，同时还制作了一些必须的仿真道具，如篷帆、木橹、锚链、绞关等。6月10这天，是第六个世界文化遗产日的前一天，天空作美遂人愿，上午还是大雨滂沱，中午突然雨停天晴，因此活动按预定计划进行。17位老船工在“清江浦船工号子”现场展演”大红横幅下面，分成四组，轮番展示了摇橹、撑篙、绞关、起锚、打篷、拉纤等活动，同时唱响相应号子。老船工们的认真传神展演，再现了当年的劳动场景。市运河博物馆馆长常贵章介绍说，船工号子作为大运河文化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京杭大运河自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后，船工号子作为一种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很好地保留传承下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季祥猛认为，如将船工号子与旅游资源相结合，能更好地丰富清江大闸和越闸的历史内涵。

船工号子是中国民歌体裁的一种。在行船中为配合航运、船务等劳动过程而演唱，以达到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的目的。它有三种类型：

一、起程号：包括起锚号、出船号、推船号、拉篷号、撑篙号等。

二、行驶号：包括摇橹号、拔棹号、拉纤号、扳橈号、扯篷号(船家用篷字而不用帆字，是一种违诗)。

三、停船号：包括下锚号、拉缆号等。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各地还有一些其他船号种类。

各类船号实用性很强，大都专号专用，多以具体劳动内容命名。同时也有一些以劳动呼号、地势、音调来源等命名，如“喂喂号”、“平板号”、“见淮号”、“呀哟号”等。但也有两种劳动用同一号子。

按地域的不同，有下列数种著名的船工号子：

黄河船号（主要是黄河中下游河南境内）、渤海湾船号、乌苏里江船号、长江船号(长江上游四川境内，中游各支流湘、资、沅、澧、西以及洞庭湖上的各种船工号子)、黄海沿岸的船号等。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广西的潯江，广东的曲江等船工号子也都各具特色。

由于船上劳动强度不一，内河航行环境不同，船号变化的幅度相当大。有的劳动强度大，协作紧密，操作紧张，这类号子实用性强，如《冲滩号子》、《绞关号子》；有的在风平浪静，平行行船时唱，这类号子实用性弱，抒情性相当浓厚，如《下滩号子》。歌词方面，前者多为劳动呼号用语；后者见景生情，即兴编词较多。清江浦船号只在风平浪静中航行的号子，多属后者，显得悠然自得如演唱地方小调。

船工号子的音乐特征：

一、沿海船工号由于分布面较广，音乐风格各有特色。北海号（流行于烟台、营口、大连、青岛一带），曲调具有冀、鲁民间音调的特点；南海号（流行于青岛以南、连云港、长江口的黄海一带），具有江、浙民间音调的色彩。内陆江、河船号如清江浦船号，比沿海的音乐性强，更富有抒情气质，曲调装饰音较多；反之，沿海船号曲调跳动较大，音域也较宽。

二、多数船工号，节奏急促，短领短和，呼应紧凑，多呼喊性音调。船上操作类型较多，因此船号的节奏型变化也较多。少数抒情性强的号子，往往是散板节奏，音调多带有山歌或地方小调风味。

三、音乐材料单一，多为上下句结构。有的前面有一个长引句。有的为了适应某种复杂的劳动过程，不同号子之间的衔接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套式。如澧水号子由“平板”、“数板”、“快板”组成。梧州船号由“平水调”、“过浅调”、“上滩调”组成。此外，有些船号由于交叉叠置的领和，还形成简单的多声部形式。清江浦船号偶会出现这种形式。

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教授周笃文先生一首“临江仙”词《清江浦》，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船工过去的艰辛和今日的盛景：

眼底斑斓石阡，千年历尽沧桑。纤夫万辈号呼忙。清江流血汗，几度演兴亡。

今日太平景象，琼楼宝气珠光。鹏飞经济彩虹长。诗潮追李杜，歌舞颂时康。

鲁一同(1805~1863)的挚友吴昆田在《鲁通甫传》中说：“其先不知所自始，或曰甘凉故世将，或曰燕京人，国初尝从吴藩平云南，已窥其有异志，挈拳而逃于淮安之山阳(今淮安区)，遂占籍焉。世居安东(今涟水县)，一同始迁清河(今淮阴区)”，方宗诚所作《鲁通甫传》亦云“及君，始迁清河”。吴、方二人皆是鲁一同至交好友，所言当属切实，且光绪版《清河县志》列鲁一同于《流寓》一节，因此可以明确地说，鲁一同非清河人，只是寓居而已。而后来以吴昆田《鲁通甫传》为底本的《清史稿》和《清史列传》里的《鲁一同传》则分别径曰“鲁一同，字通甫，清河人”、“鲁一同，字通甫，江苏清河人”，作为国史，这样的表述颇失严谨，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

关于鲁一同迁居清河之缘起，《鲁氏宗谱》里说，他在30岁那年为学友吴某(即吴昆田)应试押了一篇文章，结果题材估对，学友为感谢他，赠送他八百亩田，于是全家迁居于此。

鲁一同30岁那年，即道光十四年甲午(1834)，此时其长子鲁葵(字伯向)已6岁、次子鲁蕙(字仲实)3岁。此前，鲁一同一家人是在涟水方渡鲁庄生活的。这可从他的《携家归自南湖》(见《通甫诗存外集》)一诗中得到印证，其曰：

风日南湖道，扁舟放溜行。水花随棹涌，江鸟照波明。

鱼戏红妆影，蒲喧翠袖声。绿溪逢浣女，一讯阿侯名。

此诗描写的是鲁一同带着家人从“南湖”回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题中“南湖”即指位于方渡南边的佃湖(今石湖镇)，从诗中可知，当时此地水域面积仍很大，他们日常靠水路出行。末句后自注云“时携葵儿”，是说他们途中遇到一位在水边浣洗的女子，她还询问鲁一同身边带着的大儿子叫什么名字，看来当时鲁葵是很惹人怜爱的。这首诗可以说鲁一同与家人在方渡生活时的一个特写。

吴氏所赠八百亩田不是一块整地，而是分散于大兴庄、五里庄和汤集等处。那么鲁一同迁到清河时的居住地在哪里？他的得意门生板闸人黄钧宰在《金壶浪墨》卷五《铁犀》一文中说：“戊申初夏，与邵剑波同谒鲁通甫师于清河之大兴庄。”这条记述给出了明确答案：鲁一同在清河的居住地是大兴庄。戊申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此时鲁一同迁到清河才八年时间。后来其长子鲁葵及其后人一直居于此。到了民国年间，鲁葵的三孙鲁元照由于在农水局工作，又迁到位于西大街北侧的康阜楼居住。据今年已97岁高龄的鲁元照之子鲁宪堃先生口述，康阜楼有24间大平房，当时住了7个人，后被日本鬼子炸毁。大兴庄就由鲁元照的哥哥鲁元炳负责掌管。再后来，由于文革因素，后人外迁，大兴庄已无鲁姓人。

次说南陈集镇鲁黄庄的情况。咸丰五年(1855)，黄河北徙，洪泽湖大面积现滩，朝廷发布领地公告。在吴昆田的资助下，鲁一同领了四百亩湖滩，(一说是由其挚友清河县令吴棠资助)此处当时称为乌鱼塘，这片湖滩便由时已成年的次子鲁蕙掌管。鲁蕙的诗集《仲实诗存》里有多首诗描写此处的风土人情，如《筑室》诗开头说“买田四百亩，结庐当东偏”，《秋雨杂诗》序中说“洪湖之滨，新得官壤数百亩。……三面阻河，人迹罕到，蒲柳蔽野，鬼雁叫天。”民国时期，淮阴著名学者张熙侯在所著《淮阴风土记》中记载说：“鲁君者，乡先生鲁通甫之后也。咸丰招领，实营田宅，令子鲁仲实居此。”这里的“鲁君”是谁？鲁一同的外曾孙石汉三回忆录《昔日飞絮》里的《补述鲁一同公之后代》一文作了回答，他说：

《风土记》……所记“鲁君”应是鲁元燁表兄。因当时鲁府各房多分居各地，蔡公之长孙元炳住大兴庄，三孙元照住康阜楼，元煜住行台，二、三舅住五里庄，其他均无后，故住鲁黄庄者，只有鲁元燁表兄。

鲁元燁是鲁蕙之孙，“二、三舅”指石汉三三舅舅鲁葵、鲁槃(鲁一同幼子鲁蕙之子)。由于抗战、文革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这里的鲁氏后人在二十世纪不断外迁，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便空余地名在了。

再说三子鲁蕙(字叔杜)的居住情况。鲁蕙的儿子鲁樾是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他在乡试履历里填写的住址是“寄居清江浦城内”，可见，鲁蕙一支后来也离开了大兴庄而搬到城里了，那么具体在哪里？石汉三先生在《补述鲁一同公之后代》一文里说“三子蕙，住大兴庄西南鲁庄”，不知此“西南鲁庄”何指。倒是鲁一同的玄孙鲁达在《先高祖一同公之先世及后代》(见《淮阴文苑》第四期)一文中叙述了大致脉络，他说：

蕙有一子樾，号荫亭，以孝廉授湖北某县知县，有声。归隐后，曾购得先贤万寿祺之隙西草堂旧址，欲复建，未果，病卒，抱憾而终。且无后，以蕙之孙元煜兼祧。抗战前原居县城西北角清朝行台旧址，与淮阴师范(按：指老淮阴师范，地点在今之淮阴中学处)为邻，现已无迹可寻矣。

鲁达是鲁元煜之子，所述当属实无疑。鲁元煜原本与鲁元燁兄弟两人同居于南陈集鲁黄庄。由于鲁樾无子，就由他“兼祧”，因此鲁元煜便继承了鲁樾的家产而迁居城内，即“清朝行台旧址”，也就是鲁樾履历中的“寄居清江浦城内”的具体地址，在今清晏园附近。这一脉鲁氏人目前还有部分在淮安城里。

最后说关于五里庄与汤集的情况。据石汉三《补述鲁一同公之后代》一文，鲁蒂(1859~1938，字季循)是鲁一同与侧室赵氏(1833~1913)所生，是幼子，鲁一同将五里庄这一块田给了小儿子，其后人便在这里生活。据亲眼见过鲁蒂的已故老人李春明先生讲述，抗日战争中，五里庄园毁于一场大火，于是鲁蒂的儿子鲁槃、鲁槃便从五里庄迁至汤集街西北一里许的鲁家客庄定居，现在鲁槃之子鲁元庆仍住汤集街。

另外，鲁氏望地也在汤集，在庄园之南，仅一河之隔。据当地老人讲，望地有大小十几座坟，五六亩地面积，四周有松杉环绕，在沐阳钱集就能看到，远近人人皆知此为“鲁家松林”。

鲁一同迁居清河及后代居住地考

■ 鲁家用